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先行者的足迹

——对“中西医汇通史概”一文的若干补充

甘肃省人民医院普内科 彭 兴

读马伯英同志的“中西医汇通史概”一文（本刊1983；3（6）：376），感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，它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我国中西医汇通的历史，从而会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信心和决心。笔者愿就自己所知对该文作若干补充于后。

一、金声的“脑主记忆”说来自何人？

马伯英同志在文中正确地指出：在明末清初，传播“脑主记忆”说最力的是中医学大家汪昂；接着，他又告诉我们：“根据他（指汪昂）在《本草备要》一书中的记述，他是从同乡人金声那里听来的，而金声曾与徐光启一道习历算于西人，可见金声的说法又是从西方传教士那儿学来的。”那末，人们要问：这个“西人”或“西方传教士”究竟是谁呢？

根据有关资料^{〔1〕}证明这个“西人”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（Matteo Ricci 1552~1610）。利氏系于1582年来华，先居肇庆，后移韶州，1598年9月7日第一次抵京，“未有朝见之机”，遂折回南方，在南京居住。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北上，获准居京，直至1610年5月11日去世，前后共在京居住了近十年。利玛窦来华后，改用中国姓，在饮食起居与礼仪生活上处处模仿中国人，同时积极学习中国话及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中国化了的西方传教士，他还善于利用医疗活动进行传教，因此在京期间他“结识了瞿太素、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、王征、金声、瞿式耜等”^{〔2〕}一大批朝野闻名的中国士大夫，并“被他先后劝说入教”。根据上述资料，我们可以肯定“金声曾与徐光启一道习历算”的“西人”正是“西方传教士”利玛窦。利玛窦不仅是徐光启的老师，而且也是金声的老师。金声并非医生，自称“敬服西儒，嗜其实学”，故其“人之记忆皆在脑中”的论点正是直接来于利玛窦《西国记法》中“记舍之室在脑囊”一语无疑。

二、王清任能被称作“中西医汇通派大家”吗？

从已有资料来看，王清任不仅没有率先倡导过“中西医汇通”，而且据我的考证^{〔2〕}，他就根本没有直接接触过西方医学。故我不能同意马文关于“王清任也是一位可以跻身于中西医汇通派大家之列的”意见。

范行准先生^{〔3〕}在《王清任传》中曾首先提出王清任

可能接受过西医影响的怀疑。他说：“余尝疑清任之奋兴访验脏腑真相，由金声知识记忆在脑一语所引起，故《改错》记述脑髓说，尤称卓拔。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，自少壮逮于黄发，栖迟秽地刑场，与夫访问秋官，终成不朽之业，虽云受西医影响而得知何害。”^{〔3〕}任应秋教授对此评议道：“这固然是一种假说，但从历史时间、条件看来，西医对王清任的影响，是很有可能。”^{〔4〕}我既不赞成把王清任誉为“中西医汇通派大家”，也不同意说王清任受过西医影响仅系一种“假说”或“可能”。我同意马伯英同志的如下观点，即王清任仅“间接采纳西说”。如他在《医林改错》中明确道出其《脑髓说》来自金正希和汪切庵，而未提及西人和西学，即系一明例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他没有直接读过有关西书。

马文提出了王清任“其解剖学的革新，不知是否与读过西书有关”的疑问。虽然，“从《人身说概》等传与中国，至王清任已有近200年之久”，但我们有以下事实可以肯定他确实没有读过。（1）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“脑髓说”中只引汪切庵和金正希，不知和不提毕拱辰及“《泰西人身说概》序”；（2）若王读过《人身说概》等西书，他能为一个横膈膜耗去43年心血吗？能闹出“心无血”等一类笑话吗？（3）与王清任同时的医学家陈定泰曾在《医谈传真》中明确指出王清任的脏腑图和他从洋医中得到的洋图不一致。

三、《泰西人身说概》包含了维萨里的革新解剖学吗？

马伯英同志告诉我们：“利玛窦等传来的西洋医学，是西方古典的、以亚里斯多德和盖仑理论为主体的体系，除了‘脑说’比较新鲜，其它的东西对中医并无多大吸引力。《人身说概》包括了维萨里革新后的解剖学内容，使我国医学界耳目一新。”他对利玛窦传来的西洋医学的评价，是有道理的。但他关于《人身说概》中包含维萨里（1514~1564）的革新解剖学的论述，则颇值得商榷。因据有关资料可知，《人身说概》（邓玉函译述，毕拱辰润定，约成于1635年）与《人身图说》（罗雅谷译述，邓玉函和方华民校阅）两书“这是最早传入我国的内容较为完备的解剖学专著。两

书内容主要采取阿里斯多德、盖仑的旧说。”⁽¹⁾说其中“包括了维萨里革新后的解剖学内容”，并非事实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明万历46年（即1618年）邓玉函等来华时，曾带来西书七千部，现已查明内有维萨里的解剖学巨著《人的构造》，但不知何故在他们的译著中却未利用及论及。

四、李时珍是否接受过西洋医学的影响？

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“脑髓说”中，除了“引用汪切庵之书”外，还引用了李时珍的“脑为元神之府”这句名言⁽⁵⁾。“脑为元神之府”一语出自李时珍（1518～1593）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其意为大脑乃高级神经活动的场所，据考证⁽⁶⁾，这在中国是“首次提出精神、思维等活动是在脑不在心的看法”。众所周知，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均是认为“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，“精神之所舍也”，从无人主张过“脑为元神之府”，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李时珍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。王清任把他尊为“脑髓说”的最先倡导人，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。还需指出的是，与李时珍同时的李梴，在1575年所著的《医学入门》一书中也对“心主神明”说提出了异议。他虽承认“心者一身之主，君主之官”。但他把“心”分为“血肉之心”和“神明之心”两种，认为：“有血肉之心，形如未开莲花，居肺下肝上是也。有神明之心，神者，气血所化，生之本也。”李时珍和李梴两人殊途同归，都不承认“血肉之心”是“精神之所舍”。李梴认为主宰神明的真正器官是“神明之心”，而李时珍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大脑是高级神经活动的场所，这真叫无独有偶啊！可是，有明一代，更多的医家如张景岳等却仍坚持“聪明智慧”，莫不由心。人们自然要问：李时珍关于“脑为元神之府”的观点究竟来自哪里？为什么“众人皆醉，唯他独清”？这系他头脑中的产物，或系也来自西洋医学？

任应秋教授认为：近代中国的“脑髓说”是源出西洋医学的。他说：“总的说来，祖国医学对脑的认识较早，亦皆精确，只是记载的不多，亦不甚全面。特别

是在封建社会的长时期仅固守‘心主神明’之说，而于脑的认识毫无进步，直至明代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，逐渐为医学家所重视和吸收”⁽⁴⁾。对于他的这一评论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据此认识，我认为李时珍的观点也系来自西洋医学的影响⁽⁷⁾。

有人⁽⁸⁾认为“脑髓说”“是鸦片战争前我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时期的产物。”这一看法正确地把“脑髓说”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到了一起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在封建主义的中国只能产生“心主神明”的学说，而不可能产生“脑主神明”的观点。在明末清初之际，中国虽已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，但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落后的。故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反比西方更早地产生脑髓说，相反更有可能是西方比我们早产生这一学说。因目前尚无直接文字根据，但我们“从历史时间、条件看来”，说李时珍受过西医影响，“是很有可能的”（借用任应秋语）。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，李时珍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，接收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，这种能与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精神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参 考 文 献

1. 张慰丰·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。中华医史杂志1981；11（1）：1。
2. 彭兴·王清任与西洋医学。甘肃医药1983；1（1）：80。
3. 范行准·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。第1卷，北京：中华医史学会，1943：6。
4. 任应秋·中医各家学说。第1版，上海：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3：157～192。
5. 陕西省中医研究所·《医林改错》评注。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76：49。
6. 许自诚，等·历史地认识祖国的“心脏”，编写《医学百科全书·中医基础理论》时的体会。兰州医学院学报1979；1：108。
7. 彭兴·李时珍与西洋医学。社会科学1983；6：82。
8. 何玉德·王清任“脑髓说”的哲学意义。光明日报1978年3月24日。

· 读者来信 ·

编辑同志：

我们在贵刊今年第一期刊物中了解到贵刊准备在今后期刊中，增加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实验研究的论文，这实在反映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希望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国家对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够重视的，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，对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很多基础理论、实验研究得不到交流，这怎能提高整个医学科学的水平呢？

所以看到贵刊编委会讨论意见后，我们感到贵刊是有远见的，希望这个专栏和其它专栏一样办得更好。我是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实验与教学的，我将在今后加倍努力，多撰写这方面的稿件，作为对这工作的支持。

特致

敬意

江西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伍嘉宁

1986年4月24日